

作為文學家的趙樸初與 20 世紀“舊邦新命”

吳懷東

[摘要] 20 世紀白話文學被倡導並流行之後,古體詩常被稱作“舊體詩”,甚至被視作白話文學的對立面。然而,文學史的發展是複雜的,舊體詩也有新思想,貌似新提法有時卻是舊思想。趙樸初作為跨越晚清、民國和共和國三個時期的社會活動家、佛教領袖和文化名流,政治上與時俱進,卻堅持古體詩創作,表現了審美文化的強大傳承性。他的詩歌也在適應社會主義文化規訓而走向通俗化,表現在形式、內容以及吟詠佛理等多個層面。趙樸初詩詞創作的個例表明,文學演變的新與舊並非割裂。“舊邦新命”是一種崇高,也是一種糾結,是百年來中國文化人最深刻的體驗與宿命。

[關鍵詞] 趙樸初 古體詩 新文學 舊邦新命

[中圖分類號] I109.4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1824(2020)01-0151-10

20 世紀中國發生了千年來少有的滄桑巨變,其核心特徵就是脫離了孤立發展的軌道而逐漸融入世界體系——告別帝制,走向共和,走向現代化。這一波瀾壯闊的進程至今尚未完成,此間一切政治、經濟、文化活動都無法脫離這一大勢的深刻影響。文學的變化是社會變革的縮影,文學變革的複雜性也折射社會變革的複雜性。無論如何評價,一個基本的事實是,新文化運動興起之後,白話文學確實成為文學創作的主流,古體詩、詞、曲(以下簡稱“古體詩”)和文言文並沒有就此消失,不過很長時間內,因為白話文學與“革命”、“進步”關聯而受到關注和肯定,而古體詩與文言文與“反動”、“落後”關聯而遭到忽略甚至否定。在革命思維和兩極思維淡化的今天,如何客觀甚至“同情之了解”白話文學興起後的古體詩和文言文創作的性質、特點、作用,古體詩詞創作是否納入 20 世紀中國文學史、是否具有和白話文學同等的地位等,已成為 20 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重大問題。^①

趙樸初出生於清末,去世於新世紀的門檻上。作為世紀老人,他一生遭遇了中國數千年未有之劇烈變革——從古代到現代、從民國到共和國、從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到“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富起來”的新中國,他在家出家,以出世之心做人世之事,以慈善家和佛學居士的身份積極參與了將近百年的中國社會變革過程。他是中國民主促進會創始人之一,卓越的佛教領袖、傑出的書法家、著名的社會活動家與偉大的愛國主義者。在緊張繁忙的社會活動之餘,他的詩詞創作持續數十年而不輟,留下了大量的古體詩創作和書法作品。趙樸初出入宗教界、政界和文化界“三界”,其獨特的人生實踐和文化活動反映了 20 世紀中國社會變革的艱難歷程和文化發展的某些特徵。本文

不是從審美價值和寫作技巧角度研究趙樸初詩詞創作及其成就,更不是狹隘地在 20 世紀文學版圖中為趙樸初詩詞爭取某個位置,^②而是將其創作放在 20 世紀中國告別古代、走向現代、新舊嬗變的宏偉歷史進程中,觀察中國文化嬗變、社會革命及現代化蛻變的艱難陣痛,顯示其新舊交織的複雜性,或者說,試圖在上述社會背景下來觀察趙樸初古體詩^③創作活動的基本特徵和歷史定位。

一、趙樸初的多重角色與文學家身份

在社會大眾的印象裡,趙樸初(1907~2000)是中國 20 世紀卓越的佛教領袖和傑出的書法藝術家,在很多寺廟都可以見到他的題字,這些都是傑出的藝術品,學術界對他的生平經歷、政治活動、宗教活動、慈善活動及思想、書法作品都有深入研究,但對其文學創作的研究卻還不充分。

其實,趙樸初的著述以及文學創作極其豐富,早在 1961 年、1977 年、1978 年就先後編輯出版了詩集《滴水集》(作家出版社)、《永懷之什》(人民出版社)、《片石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 年出版了《靈山集》(九州出版社),1970 年代中期印行了《趙樸初詩詞集》,2001 年出版《趙樸初詩詞曲手跡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年出版《趙樸初墨跡選》(江西美術出版社),2013 年出版《趙樸初書法集》(文物出版社),另外,還有《佛教常識答問》、《趙樸初居士釋佛》等解說佛理的著述。2003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趙樸初韻文集》,收錄了他從 1927 年到 1999 年間所創作的作品,涉及古體詩、詞、曲、俳句、對聯乃至賦等,共收詩(詞、曲等)1985 首、對聯 279 副,達 50 萬字,數量相當巨大,性質相當於一部詩詞全集。^④如果不考慮新世紀古體詩寫作復興以後的創作情況,在趙樸初所經歷的各個時代中,這個數量也應該名列前茅。華文出版社 2007 年編輯出版了《趙樸初文集》,收入 1942 年 12 月至 1999 年 9 月重要文稿報告、講話、談話、文章、信件 297 件,其中 1940 年代只有 1 篇,文革十年 1 篇,主要是“十七年”和文革後的文章。2015 年初,安徽教育出版社宣布組建“趙樸初全集”編委會,如今尚未見到出版消息,不過,可以預知文字體量肯定十分宏大。

趙樸初詩詞創作不僅數量巨大,其成就也得到時人高度認可。周恩來就非常欣賞他的文學才華並介紹他加入中國作家協會。^⑤夏衍曾說:“趙樸老行文恬淡,詩也如此,他不用慷慨激昂和轟轟烈烈的詞,同樣能激勵人。”^⑥趙樸初於 1960 年就加入中國作協並當選為理事。1985 年,中華詩詞學會成立,趙樸初被聘為第一屆理事會顧問。1990 年日本龍穀大學還授予趙樸初文學博士學位。

中國的 20 世紀是苦難的世紀,在救亡圖存的歷史進程裡,文學發揮著不可或缺的巨大作用。與此同時,在中國的傳統觀念裡,一代宗教領袖,一代政治家,如果沒有良好的文學藝術修養,那肯定也是不合格的——“德不配位”,難以持久,這是與今天完全不同的價值觀念和社會認知,在這種觀念的作用下,當時的政治人物也都有數量不等的文學創作。就現有的對趙樸初的認識而言,其社會活動的豐富性及其政治、宗教、文化活動之間的內在關聯尚沒有得到充分闡發,他身為佛教大師的光環或多或少影響了我們對他作為文學家成就的認識。

二、政治上的趨新與文體選擇的守舊

在一個以“革命”、“救亡”為主流話語的時代氛圍中,趙樸初於 1920 年離開家鄉來到當時中國最繁華、時尚的城市上海,積極投身時代潮流,在戰亂頻仍的 20 世紀三、四十年代,他以菩薩心腸投身救災救難的社會工作,愛國愛民,救苦救難,並與時俱進,追隨共產黨,與時代同行。可是,他的文學創作卻沒有選擇新文化運動以來主流的白話及其文體形式——小說、戲劇、白話詩等,而是沿用新文化運動所聲討、欲打倒的古體詩詞曲形式,趙樸初的社會活動與文化活動體現出趨新與堅守交

織的複雜狀態，政治上追求進步的不斷趨新與文學文體選擇的守舊構成了鮮明的對照。

今天能看到的趙樸初最早的作品是1927年所創作詩歌的殘句：“江南五月風如酒，一路山花醉眼看”，採用古體詩的形式，寫出了五月江南自然風景的特點——東風浩蕩、天氣溫暖、山花盛開，其一個“風如酒”的巧妙比喻，既寫出了氣候之溫暖，更寫出了作者心頭之溫暖，構思精妙，想象豐富，意境清新，正是作者青春心態的自然流露和藝術才華的牛刀小試。我們今天能夠感受這一詩句之美，正在於其傳承了中國人深入骨髓的審美精神。當然，這句詩沒有佛教出世意味，而是歌頌世俗風景——江南春風、春花、春暖，流露了作為熱血青年的生活激情，符合一個剛剛進入社會的年輕人的理想主義立場，這與後來作為佛教居士的詩風明顯不同。其時，他正在東吳大學就讀，老師中就有沐浴著新文化運動的陽光成長起來、剛從法國學成歸來的安徽同鄉蘇雪林。^⑦但是，趙樸初在1927年夏天因肺結核病而終止學業，進入上海佛學界，從此也告別了新派文學，回歸傳統。

趙樸初開始文學創作活動的時代已處於新文化運動興起並取得全面勝利之後，而他卻沒有隨波逐流，從他的成長經歷可以判斷其文體選擇和文學興趣來自故鄉文化的熏陶。“新文化運動的偉大旗手”陳獨秀是趙樸初的安慶同鄉，以理學和古文為特色的安慶竟然孕育了古代文化的“逆子”，這種複雜多元的地方文化也建構了趙樸初的文化心理底層。安慶地區從明末以來一直是文化極為活躍的地區，清代安徽建省之後長期作為省會，伴隨著安徽政治、經濟、文化中心地位的形成，趨新與堅守這兩種不同的思想都極其活躍。這裡曾出現了父子宰相張英、張廷玉，出現了狀元趙文楷、李振鈞以及一大批進士。桐城派就是由姚鼐完成創派工作，而早在姚鼐之前，明清之際出現了方以智、戴名世以及方苞、劉大櫟等一大批傑出的文學家；姚鼐之後，桐城派更演進為全國性的文學流派，開枝散葉，其文學影響和思想影響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作為安慶府的屬縣，趙樸初故鄉太湖縣“屏蔽荊楚，襟帶江淮”，“山川深秀，風土清美”，“元代始建縣學，元統年間縣人黃信一狀元及第，明代有社學八所，還建有同春、正學兩所書院，可容聽眾2000多人”，此地元明清三代，“有文武進士82人，文武舉人342人，尤其有清一朝，可謂人文鵲起，科甲蟬聯”。^⑧文風的昌盛一方面有助於思維的開放和新文化因素的吸納，從安慶走出來的陳獨秀、宗白華、朱光潛、方東美、鄧稼先以及嚴耕望、余英時等與時俱進，吸收最新的外來文化而走在時代文化的前列，從而成為中國20世紀文化史、學術史上開風氣的一時之傑；另一方面，又在社會文化大潮發生重大變革之時保留了傳統的慣性，舊文化仍然具有強大的生命力。^⑨雖然在趙樸初青少年時代，新文化運動已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蓬勃展開，而在相對封閉的太湖，傳統文化的氛圍依然濃郁，家鄉的文學風氣以及佛教氛圍影響了趙樸初一生的道路。1915年蘇雪林考入安徽第一女子師範，她覺得“安慶這個省城也有些奇，上有武漢，下有京滬，兩處文風均甚發達，而安慶也算是個戰略要地，文化卻偏偏落後，風氣甚為閉塞”，所學的還是古詩文，特別是桐城派古文^⑩——蘇雪林的印象正反映了安慶地區文化的一般面貌。

趙樸初為清嘉慶元年狀元趙文楷(1760~1808)之後裔，出生於安慶，5歲時隨父母遷回老家太湖縣寺前居住，7歲入私塾讀書；1919年，13歲的趙樸初離開家鄉到達上海，於1922年進入蘇州東吳大學附中，1926年考入東吳大學學習，1927年因生病和戰事而被迫終止學業，進入社會。可以說，年輕時在家鄉培養起來的文學興趣以及佛教信仰影響其一生。趙樸初在1977年撰寫的《片石集》“前言”中說：“幼年時，由於家庭和環境關係，胡亂讀過一些古詩詞，逐漸受到了感染，發生了興趣。”^⑪精神的胎記伴隨著一個人的終生，正如從小受到母親以及家鄉佛教文化的影響而終身信仰佛教一樣，對古詩詞的愛好也伴隨了趙樸初的一生。

三、“舊瓶裝新酒”與詩體的意識形態性

然而，舊體並不一定就是守舊。政治與文學選擇的矛盾其實不止趙樸初，換言之，趙樸初的文學選擇也是他那一代人的選擇。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文學是在急切救亡的背景下展開的，因此呈現出激烈的反傳統姿態，在新文化運動中，提倡新文學，舊體詩詞的形式及其承載的思想觀念被簡單粗暴地否定。然而，作為一種與政治和社會革命有一定距離的審美文化，古體詩詞並沒有因此而消失，仍然是人們表情達意的重要形式，即使是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魯迅以及白話文學的傑出作家郁達夫，革命領袖和開國元勳毛澤東、朱德、陳毅、董必武等人，也都是古體詩的愛好者和高超的寫手。即便在“文革”激烈否定傳統文化的環境裡，古體詩的藝術美仍然積澱在中國人的審美感覺之中。例如，1976年的天安門事件中，有不少詩歌所採用的詩體形式就是古體詩。^⑫

如何繼承傳統一直是白話詩創作領域的重要問題，同時，古體詩如何面對白話文學的挑戰繼續生存也一直是重大的問題。如何化解文體選擇上的守舊與共產黨批判傳統、追求變革、提倡大眾文學、反對貴族文學的緊張的意識形態衝突，是共產黨領袖必須思考並解決的重大理論問題。我們可以看到經歷五四新文化運動最後成長為新中國開國領袖的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解決思路。

1957年《詩刊》創刊，公開發表了毛澤東古體詩詞，毛澤東在給《詩刊》編輯部《關於詩的一封信》中說：“遵囑將記得起來的舊體詩詞，連同你們寄來的八首，一共十八首，抄寄如另紙，請加審處。這些東西，我歷來不願意正式發表，因為是舊體，怕謬種流傳，貽誤青年；再則詩味不多，沒有什麼特色。既然你們以為可以刊載，又可為已經傳抄的幾首改正錯字，那末，就照你們的意見辦吧。”“舊體”之“舊”，當然是陳舊的意思，不單指時間，更重要的是指性質，這就是毛澤東對古體詩詞的基本立場。雖然他接受了《詩刊》的約稿，但他又說“詩當然應以新詩為主體，舊詩可以寫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因為這種體裁束縛思想，又不易學”。《人民日報》在1977年12月31日公開發表了毛澤東1965年給陳毅談詩的一封信，其中說：“詩要用形象思維，不能如散文那樣直說，所以比、興兩法是不能不用的。……要作今詩，則要用形象思維方法，反映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古典絕不能要。但用白話寫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民歌中倒是有一些好的。將來趨勢，很可能從民歌中吸引養料和形式，發展成為一套吸引廣大讀者的新體詩歌。”這段話內容豐富，最重要的理論觀點就是詩歌創作需要形象思維，這似乎解決了白話與古體之爭——只要有形象思維，詩不分古今。毛澤東對白話詩的觀點值得注意，他認為白話詩“幾十年來，迄無成功”，同時要求白話詩和古體詩在內容上都要“反映階級鬥爭與生產鬥爭”——反映當下的社會生活，而詩歌的形式（語言和體式）也必須相應地進行改革，顯然古體詩改革的任務更重。毛澤東的詩歌思想是當時的最高權威，代表了中國社會主義詩歌寫作的基本規範，並指出了解決詩體形式與內容的矛盾問題的方向。

趙樸初從離開家鄉到上海和蘇州求學，就面對著當時勃興的新體白話詩。他寫道：

“五四”以後，有人又提出了語體新詩主張，打算索性拋棄舊形式，從根本上徹底改革我國詩歌。不少人曾為此從各方面付出過可貴的勞動。可是，詩與文究竟不同，詩歌與口語差別更大。要做到既是全新的，又是大家熟習的；既是現代的，又是適合民族口味的；既是通俗易懂的，又是經過琢磨鍛煉的；確實不是一件容易事。因之在“五四”後的新文學中，詩歌的成就，較之其他領域，如散文、小說、戲劇等等，總覺得差著一籌。我由於個人愛好，對於所謂新舊這兩種詩體都曾作過若干嘗試，而結果則都不大理想。新事物、新情感、新思想，是否可以入詩？如果可以，應當如何寫？舊形式是否還可以用？如果可用，應當

如何用？這些都是常在腦筋裡盤旋的問題。後來反復體會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精神，才撥開了頭腦裡的疑霧，打通了心上的茅塞……毛主席在這篇光輝著作中首先指出，一切文藝都應以人民大眾（具體說就是工農兵）為服務對象，人民的社會生活是一切文藝的源泉。這是根本。對於文藝工作上許多具體問題，如思想性與藝術性，普及與提高，繼承與創造，動機與效果，歌頌什麼與暴露什麼，等等，毛主席都作了明確、精湛的原則性的指示。^⑬

趙樸初在這篇長篇前言裡還討論了他糾結或探索的內容，他覺得詩歌必須表現新的時代生活，而形式可以沿用古體。白話新詩如何繼承古體詩的經驗，自1920年代起從聞一多、戴望舒到林庚都在積極探索，^⑭古體詩的改革也在進行，這種觀點就是眾所周知的“舊瓶裝新酒”之說法。趙樸初提出：“可否還是酌採人民原已熟習的傳統的詩體，即詩、詞、曲的形式，先解決群眾的需要問題，並借此提高一般群眾對詩歌語言的接受水平，同時，通過實踐，檢查在古典詩歌中究竟有哪些是還可以繼承或可以借鑒的東西，為創造將來新詩格局尋找途徑。儘管‘新酒舊瓶’之譏，在所難免，但主觀願望還是想依主席‘古為今用’的方針，做一點‘推陳出新’的工作。”^⑮所以，趙樸初沿用了古體的詩和詞，尤其喜歡曲，在他看來，“曲”有不少優點，如“比較接近現代人的情感與語言”，“可以更自由地使用一切足以取得預期效果的各種表現手法與作風”，突破詩詞在句型、字數、句數等方面的形式限制，“除了供演出使用的劇本外，另有專供閱讀的‘散曲’”等。^⑯

他在1976年12月的《毛主席致〈詩刊〉函發表二十周年紀念座談會獻詞》裡認同毛澤東的說法：“文藝改革詩最難，大約需要五十年”“舊型那足供回旋？新詩為主勢必然”“牧歌民謠詩本源”。在他看來，古體詩不是文學的主流，其內容必須要面對新的社會現實。1987年他還說到：“一九五三，鄭振鐸同志也在一篇文章中談到，中國詩的形式到現在還是一個沒有解決的問題，還處在一個探索的階段。”他主張“尊重我們的傳統，民族詩歌的傳統”，這一傳統形式層面的重要特徵就是有節奏，有韻律，遵守平仄規律，講究韻腳一致，^⑰具體體現就是古體詩的形式與格式規範。

趙樸初的新體白話詩創作今天已看不到，根據他晚年的意思編輯、出版的《趙樸初韻文集》所收則全部為舊體詩詞曲以及對聯。然而，趙樸初當然並非抱殘守缺者，他在形式上堅守古體詩詞的基本韻律規範，但文字更為淺易、平仄押韻的規則比較寬，並且創制很多漢俳、自度曲等；同時，趙樸初也要求古體詩詞在思想上、內容上必須改革，必須反映當下的社會生活。應該說，趙樸初的詩歌觀念體現了和主流思想的高度一致，他用大量的詩詞創作落實“舊瓶裝新酒”的說法。

四、“現實主義”與趙樸初詩詞的主要內容

《趙樸初韻文集》雖在趙樸初身後出版，卻經過趙樸初生前親自審定，所收作品除了附卷收錄對聯之外，分為十卷。是集選用了三首詞作為代自序，第一首《金縷曲》（王昆侖同志為文談余詩詞，章孤桐先生為拙稿題詩，皆獎飾過當，感其鼓勵之意，賦此答謝）有句云：“慶東風、鼓吹何辭鬧？”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反映了自覺接受共產黨領導的趙樸初建國後詩詞創作的思想，即社會主義現實主義文學思想。按茅盾的解釋，現實主義就是要反映現實，揭露敵人，歌頌人民，“現實主義文學總是充滿了樂觀主義精神，富於不屈不撓的求生意志的”。^⑱趙樸初自覺接受共產黨文藝思想的指導，堅持“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為無產階級政治服務”，以“表現工農兵為核心”，趙樸初的詩詞曲創作生動地反映了他親身經歷的社會生活。文集編者云：這些詩詞作品“既連接為記錄作者本人漫長的世途和心路歷程的生活畫卷，也連接為展現上個世紀三十年代起七十

年代中政治風雲的歷史長卷。至於其眾多作品中對佛學哲理的闡發、對宗教政策的表達以及與日本、韓國、印度、東南亞各國的佛教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的記述，則是研究當代佛教發展史、交流史的一份珍貴史料”。^①其作品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涉及世俗事務的詩歌，包括歌頌黨和國家領導人、歌頌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作品，另一類則是涉及佛事活動、佛教外交的詩詞，後者數量更多。當然，與政治關聯的作品，在後來編集時被有意剔除了一些。

由於趙樸初獨特的身份和經歷，他有些作品對 20 世紀某些重大政治事件和政治人物有深刻的臧否，有些創作在當時發生了極大的社會反響。例如，1964 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舉國揚眉吐氣，欣喜若狂，與此同時，前有美國總統肯尼迪遇刺，後有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下台，中間有印度總理尼赫魯拙劣的反華表演，趙樸初因此創作了散曲《某公三哭》，三個曲子分別由毛澤東改名為《禿廝兒帶過哭相思·哭西尼(肯尼迪)》、《哭皇天帶過烏夜啼·哭東尼(尼赫魯)》、《哭途窮·哭自己(尼·赫魯曉夫)》後公開發表。如《禿廝兒帶過哭相思·哭西尼》：

我為你勤儉妝台，濃施粉黛，討你笑顏開。我為你賠折家財，拋離骨肉，賣掉祖宗牌。可憐我衣裳顛倒把相思害，才盼得一些影兒來，又誰知命蹇事多乖。真奇怪，明智人，馬能賽，狗能賽，為啥總統不能來個和平賽？你的災壓根是我的災。上帝啊！教我三魂七魄飛天外。真個是如喪考妣，昏迷苦塊。我帶頭為你默哀，我下令向你膜拜。血淚兒染不紅你的墳台，黃金兒還不盡我的相思債。我這一片癡情呵！且付與你的後來人，我這裡打疊精神，再把風流賣。

這組散曲把姓名中含有“尼”的政治人物聯系起來，詼諧風趣地進行諷刺挖苦，用典適切，用詞精當，敘事嚴實，比喻貼切，是三首難得一遇的政治諷喻詩，配合了當時中央的國際鬥爭，發揮了重要的社會輿論作用，當時在國內外產生了極大的反響，轟動一時。又比如“文革”結束後，趙樸初創作的借古諷今的《故宮驚夢——江青取經(觀故宮博物院慈禧罪行展覽後作)》(套曲)，也是轟動一時的名作，很有代表性，如其開始曲【字字雙】云：

宮門騎馬帶夥計，四匹。紅旗車隊後跟隨，神氣。向來佩服武阿姨，皇帝。無奈乾陵還封在山溝裡，可惜。且圖就近訪慈禧，有理。早安排包管稱心的見面禮，表意。送您一副假牙好啃童子雞，補氣。送您一副假髮好和姑娘比，美麗。送您一套特制布拉吉，換季。送您一架萊卡照相機，拍戲。有人勸我把文藝大旗也送你，放屁。老娘少了它怎能混下去，哎！這分明是反革命的壞主意，可氣。趕快給我拉出去，槍斃！^②

雖然文體屬於古已有之的散曲，但此曲語言不避俚俗，嬉笑怒罵，具有強烈的諷刺效果。趙樸初作品中，散曲最有特色。之所以選擇套散的形式，顯然他是注意到散曲的通俗性。相對於詩詞，在元朝出現並流行起來的散曲通俗性更加明顯。^③

總體而言，趙樸初的詩詞內容反映社會現實、尤其是重大政治問題，在遣詞造句以及藝術上也比較大眾化、比較淺俗，表明他雖然沿用了古體詩的形式，也在因時而變。這是白話文學影響的結果，更是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精神和共產黨文藝政策引導的結果。^④

五、“人間佛教”與僧詩的現代演進

趙樸初自小受到家鄉太湖佛教文化和信佛的母親的熏陶，而因病離開東吳大學到上海後即到表舅關絳之身邊工作，並受其影響積極參加佛教界救世化俗的社會活動。1935 年秋天，圓瑛法師在上海興辦圓明講堂，趙樸初經其介紹而皈依佛門，成為在家居士。抗戰期間，他以居士的身份從

事慈善活動,救苦救難。建國後,居士是趙樸初參與社會活動的基本身份:1949年9月,他作為兩位佛教界代表之一(另一位是巨贊大師)受邀參加第一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1953年,中國佛教協會成立後任副會長兼秘書長;1980年開始擔任中國佛教協會會長直至去世。可以說,佛教信仰影響了趙樸初一切的社會實踐活動,他承襲了古代詩、僧結緣的傳統又具有新的特點。

值得注意的是趙樸初時代佛教本身的新變,這種變化是20世紀中國社會演變導致的結果。20世紀以來,佛教面臨巨大挑戰:民國時期,軍閥混戰,外敵入侵,國共內戰,民不聊生,佛教不得不面對苦難的時局,同時,伴隨著科學的昌盛,特別是新中國建立之後馬克思主義被確立為主導思想,作為一種重要的文化傳統的佛教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和很大的調整。王守常、錢文忠曾指出,佛教“在各自本國文化的土壤上枝繁葉茂,開花結果。其中固然有許多歷史的機遇,但佛教不預設超越眾生的造物主,且不舍世間的理念實在是最為主要的原因”。^②宋朝以後,佛教與上層精英文化產生了一定的距離,而與世俗文化日益融合,這是總體的趨勢。20世紀是科學昌明的世紀,古老的佛教因應現代社會的需要而不斷變革。謝重光認為:“現代人間佛教運動,由太虛法師首倡,印順法師發揚而光大,近一個世紀來海峽兩岸的佛教界付之實踐,已蔚為現代佛教發展的主流。由於人間佛教的旗幟高揚於現代,力行於現代,有人或許會認為人間佛教的思想是現代才產生的,其實這是一種誤會。人間佛教不是無源之水,其思想淵源蘊含於佛陀創立的原始佛教之中,更盛行於中國兩千年傳播的佛教主流大乘佛教之中。”^③這屬於文化問題。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主政後,有神論的佛教如何與馬克思主義唯物論相處也是一個重大的現實政治問題。

趙樸初基於強烈的社會關懷積極入世,順應了佛教入俗的大趨勢,進一步發展了太虛大師最早提出來的“人間佛教”的思想,以深湛的佛學修養和極高的智慧積極探索佛教與馬克思主義無神論思想、社會主義文化、共產黨領導的兼容與圓融,從而深得黨的信任,並引領佛教重新興盛,他也逐步成長為一代佛教領袖。趙樸初對“人間佛教”的具體修持內容和目的有過清晰的解說:“人乘、天乘、聲聞乘、緣覺乘、菩薩乘這叫五乘。其中後三種叫出世間法,教理深奧,比較難懂;前二人天乘教是世間法。世間法是世人易學而能夠做到的,也是應該做到的,前人名之為人間佛教。人間佛教主要內容就是:五戒、十善。……假使人人依照五戒十善的準則行事,那麼,人民就會和平康樂,社會就會安定團結,國家就會繁榮昌盛,這就就會出現一種和平安樂的世界,一種具有高度精神文明的世界。這就是人間佛教所要達到的目的。”^④關於趙樸初佛教思想的獨特性,有學者論之甚詳:

趙樸初繼承了大乘佛教的思想傳統,明確肯定世俗性的意義。……取大乘佛教關於滅諦“無住涅槃”“涅槃與世間,無有少分別”的解釋,他強調應“在因緣生滅的世界中,永無休止地做‘莊嚴國土、利樂有情’的事,而隨時隨處安住在涅槃的境界”;取緣起觀“一切眾生皆是我父母”“視眾生如一子”的大慈悲心的解釋,強調菩薩行的人生觀:“只有利他才能自利,這就是菩薩以救度眾生為自救的辯證目的,這就是佛教無常觀的世界觀和菩薩行的人生觀的具體實踐,這也是人間佛教的理論基礎。”“為社會服務,是我們佛教徒的天職。”通過利他而自利,以救助眾生為自救的方式——這種菩薩行的入世態度,亦即弘一法師所推崇的“以無我之精神,努力切實做種種之事業”的人生觀,成為達到出世目的的必需環節。這樣,世俗生活即是道場,世俗性就是神聖性的必要外現。^⑤

面對科學思潮和各種現代思想,傳統佛教的流派之別已趨淡化,而趙樸初身為新中國的佛教領袖,既要面對國內廣大的佛教流派,也要與國外佛教流派進行友好交流,因此,他淡化了佛教傳統的宗派思想,表現出博學與包容:修持、慈愛、寬容、平易,構成所有佛教信仰者外在社會行為的最大公

約數和共同特徵。這也是趙樸初基本的佛學立場，慈眉善目的微笑便成為他終生最經典的形象。他強調：“諸惡莫作、眾善奉行、莊嚴國土、利樂有情，這樣才能把握自己，自度度人。”^②

“人間佛教”觀念既是趙樸初參與一切社會活動的指導思想，是其一生救苦救難、愛國化俗的動力，也是影響其詩詞創作境界與風格的最重要因素。趙樸初通過詩詞創作，一方面實現個人精神的提升，另一方面借以化俗，正如他一生為很多寺廟題字一樣。宋人李之儀早就說過：“說禪作詩，本無差別，但打得過者絕少。”（《姑溪居士前集》卷二九《與李去言》）佛教化俗，要借助文學的力量，如唐代王梵志的通俗詩以及敦煌變文等，趙樸初就特別注意到佛教與古代文學的關係，因此，他的涉佛詩詞（包括為佛寺和廣大信眾的書法題寫）創作正是上述傳統的發揚光大。

關於佛教對其詩境的影響，趙樸初對此有過明確的自我評述：“我年輕的時候寫詩曾送給一位先生^③評看，他看過我的詩後就講，你寫的詩最大的毛病就是帶有禪的意念，禪是講‘空，講解脫的，而詩則不同，寫詩不要過分地把禪的意念擺進去，如果所寫的詩帶有禪的意念，就要像蘇東坡的詩詞那樣，如同淡水中稍微加一點鹽，恰到好處。”^④趙樸初顯然理解並尊重世俗者的考慮，這體現了他謙虛高尚的人格，其實，這種質疑恰恰揭示了趙樸初詩詞作品的佛教色彩。除了在其詩詞中有大量刻畫佛寺、佛教故事的內容以及直接的佛教詞彙之外，趙樸初詩詞還喜歡談論佛理，如《贈奧比斯眼科飛行醫院》：“眾生有盡，大悲心光明。光明照十方，千手開千眼。”^⑤作者將眼科醫生治療好患者的眼病，重見光明，而以佛教發大悲心普慧世間作比，既是言事，也說佛理。在我們世俗人看來，少數即事寫景詠物的詩歌，散發出盎然禪意，具有一種空靈靜美脫俗之感。如《題〈茶經新篇〉》：“七碗受至味，一壺得真趣。空持千萬偈，不如吃茶去。”^⑥1987年訪日撰《八月九日，庭野日敬先生自東京來；十日，山田惠諦長老自京都來》五首之一、二云：“此地即淨土，此會即靈山。三人此聚首，一大事因緣。日浴清淨水，日著清淨衣。內外俱清淨，濁世願無離。”《八月十五日》詩云：“散步入松林，萬綠浸形影。賓主共忘機，筇聲亂復整。”這些詩用語平實，而禪意濃郁，讀之令人忘機，正如柏岩明哲禪師的體會：“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景德傳燈錄》卷七）。

從世俗的眼光看來，文學藝術與佛教在本質上也有一定的兼容性。藝術審美，就是通過感性的形象引導人超越世俗、追求真善美，而佛教超越現象，靜觀宇宙永恆變幻，獲得心靈的恬靜安詳，並且引導人積德行善，二者在目的和表達手段上有一定的交叉或相同之處。叔本華談及月光之美時說：“為什麼滿月的景色具有這樣一種仁慈的、寧靜的和崇高的印象？因為月亮是一個觀照的對象，卻從來不是欲求的對象。”^⑦藝術和宗教都具有一定的引導人擺脫物質有限性對人肉體和心靈束縛從而具有實現精神自由、張揚個性的共同作用。王國維在《紅樓夢評論》中也說：“美術之務，在描寫人生之苦痛與其解脫之道，而使吾儕馮生之徒，於此桎梏之世界中，離此生活之欲之爭鬥，而得其暫時之和平，此一切美術之目的也。”王國維所謂“美術”就是藝術。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趙樸初詠歎佛理的詩詞，淡化了宗教之色彩，具有類似文學審美的“望峰息心”、“窺谷忘反”（吳均《與朱元思書》）之功效。其1996年十月在北京醫院作佛偈“生固欣然，死亦無憾。花落還開，水流不斷。我兮何有，誰歟安息？明月清風，不勞尋覓”以花為喻，我們由此想到《華嚴經》中之說：“一切眾生而為樹根，諸佛菩薩而為花果，以大悲水饒益眾生，則能成就諸佛菩薩智慧花果”。

總體而言，趙樸初延續了詩僧一體的傳統，其所吟詠思想並不深湛，整體風格也很通俗，詞彙典故並不生僻，可以目為唐代以來佛教通俗文學傳統的現代傳承。但需強調的是，佛教面對20世紀中國社會文化民主化、平民化、大眾化而主動進行自我調適，面對社會主義大眾化、通俗化的意識形態壓力而主動應變，趙樸初身為當代佛教領袖，其詩歌的通俗化顯然與這個大背景有關。

六、餘論：趙樸初的出世、入世與中國的新、舊嬗變

身為佛教虔誠信仰者的趙樸初也生活在萬丈紅塵之中，生活在 20 世紀多災多難的中國，他的人生道路和文化活動關聯著 20 世紀中國的進程與命運。20 世紀是苦難的世紀，也是古老中國實現鳳凰涅槃的世紀，民族解放、國家獨立、社會革命、文化革新相交錯，有血與火，有戰爭與死亡，有不屈的抗爭和堅守：從大清滅亡到民國建立，從北伐戰爭到抗日戰爭，從國共內戰到人民共和國建立，從十七年探索到十年“文革”，從 1978 年開始改革開放到 20 世紀結束，中國從開始不得不屈辱地接受西方文明，到逐或被動或主動地融入世界大潮，先進與落後、革命與反動不斷激烈碰撞，在這個高速而劇烈變化的過程中，新與舊處在一個複雜交錯的狀態。

趙樸初不是叱吒風雲的革命家和政治領袖，只是社會活動的積極參與者，他關注社會，關心人間，在基本社會價值觀上與時俱進，卻不激進。他的佛教傳播活動是化俗的途徑，而他的詩詞不僅是個人審美的愛好，也是他化俗的渠道。一生豐富的詩歌創作，正是他以一位佛教信仰者關愛人間憂樂的具體而豐富的表現，他欣喜於祖國的建設成就，對基層群眾受苦受難感同身受，關注國際和平，關心友朋，這些詩詞中的憂樂之情汨汨而出，這是一種虔誠的佛教信仰者慈悲為懷者的胸中世界，是出世者的入世境界，這也是他與社會主義兼容的感情基礎。趙樸初古體詩創作不同於白話文學創作的專業性和主流性，而是屬於其工作餘事，更多屬於個人愛好和交流應酬，而且，這些詩詞內容與形式都表現出明顯的通俗性，這和他的“人間佛教”思想一樣，也是社會主義制度與文化強大力量影響之結果。另外，我們看到，趙樸初在文學創作的形態上不趨時，幾十年堅持不輟，反映了古體詩作為一種審美傳統文化強大的慣性存在，而從文學演進的角度觀察，即使面對劇烈的政治變革與社會變革，文化審美傳統仍然保持了相對的文化恆定性。趙樸初詩詞創作就是承與變、新與舊的結合體，新中有舊，舊中有新，這也顯示了人類社會文化活動的複雜性——文學及其演變不同於政治及“革命”，其評價並不遵循先進與落後對立的邏輯，即使活躍在政治舞台中央也仍然帶著故鄉文化的胎記，這其實也生動地揭示了人類社會基於功利的目的不斷“革命”、不斷前進而民族與國家卻能夠保持其基本文化特徵這一現象的內在邏輯。

“舊邦新命”（馮友蘭《西南聯合大學紀念碑文》），今天的中國仍然處在從 1840 年開始、經過新文化運動至今仍在持續的逐漸融入世界的偉大而悲壯的歷史進程中，中、西與古、今的矛盾與糾結是生活於其中的中國人內心最深刻的體驗與糾結，從代表性和典型性角度看，趙樸初的創作乃至人生道路深刻地折射了這個本質的時代宿命。

①樊駿、黃修己、錢理群、陳思和、孔範今、范伯群以及陳友康、王澤龍、馬大勇、劉夢芙、曹辛華等都對此問題發表過見解，其中一些觀點甚至針鋒相對，參見孫志軍：《現代舊體詩的文化認同與寫作空間》，武漢：華中師大文學院，博士學位論文，2004 年；馬大勇：《20 世紀詩詞文獻研究的問題與方法》，湖南湘潭：《中國韻文學刊》，2011 年第 3 期。

②當下趙樸初研究頗熱，在現有成果中，研究其生平

活動及其“人間佛教”思想的論文最多，也有不少書法藝術的論文，而專門研究趙樸初文學創作（詩詞曲賦）的論文不多。近年來不少學者倡導研究 20 世紀的古體詩詞曲以及文言文創作，不過有關論著幾乎對趙樸初詩詞沒有著墨，為數不多的學術成果有：徐志嘯：《論趙樸初先生的舊體詩詞曲創作》，福建漳州：《漳州師範學院學院報》，2004 年第 3 期；周萍、麗娜：《現代舊體詩的現代性——論佛教領袖趙樸初居

士的詩歌創作》，上海：《華東師大學報》，2013年第2期；鍾揚：《中國新詩格律化嘗試——論趙樸初的“自度散曲”》，合肥：《江淮論壇》，2005年第5期；王彥明：《人間佛教與趙樸初佛教文學略論》，哈爾濱：《哈爾濱工業大學學報》，2015年第5期；等等。安徽省趙樸初研究會主辦的《趙樸初研究動態》（已更名為《趙樸初研究》）刊載了不少研究趙樸初詩詞曲的論文，這些論文一般篇幅不大，且大多賞析趙樸初的具體作品，作者大多是與佛教界關係密切的詩詞愛好者。中華詩詞學會與安徽省趙樸初研究會還於2018年10月在趙樸初故里太湖縣聯合舉辦了趙樸初詩詞研討會。上述學者重在討論趙樸初詩詞的寫作技巧以及“現代性”問題，而本文則是從國家演進的現代性的角度論趙樸初詩詞的特點。

③本文所討論趙樸初創作，涵蓋古體詩、詞、曲、賦、對聯等，為表達簡便，一律概稱“古體詩”。

④趙朴初：《趙樸初韻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該集按編年編排，頗便於閱讀和研究，但所收作品不全，還有意刪汰了一些作品，特別是與過往政治關聯密切的作品，如就沒有收入本文引述的《故宮驚夢》（套曲）。

⑤轉引自余世磊：《趙樸初與中國共產黨的深厚情緣》，合肥：《黨史縱覽》，2006年第1期。

⑥轉引自沈祖安：《我與趙樸初的交往》，石家莊：《文史精華》，2008年第6期。

⑦⑩蘇雪林：《蘇雪林自傳》，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1996年，第69、35~36頁。趙樸初退學後，主要是跟隨關綱之在上海佛學界活動，文學上對他影響很大的有舊派文人陳曾壽，其侄女、即陳曾毅之女陳邦織後來成為他的夫人。

⑧余世磊：《母兮吾土——趙樸初與故鄉安徽》，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2頁。

⑨清代中葉乾嘉漢學在江浙與徽州大興，而與徽州同屬安徽省的安慶桐城依然流行理學，正是在與漢學的競爭中才誕生了桐城派。

⑪⑬⑮⑯⑰⑱《片石集》前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

⑫童懷周：《天安門詩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

⑭參見王珂：《百年新詩詩體建設研究》，上海：上海

三聯書店，2004年。近年來，新詩（白話詩）寫作與研究再度成為社會熱點，其自身獨立價值似乎已經不是問題，有的學者正是以此為前提討論新詩與傳統詩詞的內在關聯，如趙黎明《古典詩學資源與中國新詩理論建構》（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等。

⑰⑲趙朴初：《趙樸初居士釋佛》附錄，北京：中國長安出版社，2005年，第183、188頁。

⑱茅盾：《夜讀偶記》，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1958年，第40頁。

⑳趙朴初：《趙樸初韻文集》“編輯出版說明”。

㉑趙樸初擅長散曲、組詩（詞），關於趙樸初對詞牌、詞調的選用及偏好等藝術問題，學術界已有專門研究，參見中華詩詞學會、安徽省趙樸初研究會：《全國趙樸初詩詞研討會暨“樸初故里禪源太湖”詩詞大會論文、詩詞集》，2018年，此處不贅。

㉒前引鍾揚和周萍、麗娜等文從“現代性”角度認識趙樸初古體詩形式與內容通俗化的變革特點，本文則強調主流意識形態的引導作用。

㉓王守常、錢文忠編：《人間關懷——20世紀中國佛教文化學術論集·序》，北京：中國廣播電視新聞出版社，1999年。

㉔謝重光：《人間佛教的思想淵源與早期實踐》，福建寧德：《寧德師範學院學報》，2016年第1期。

㉕㉖趙朴初：《佛教常識答問》，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年，第134、135~136、136頁。

㉗陳二祥：《心靈轉化：趙樸初人間佛教的內裡分析》，西安：《西北大學學報》，2017年第1期。

㉘按，朱洪《趙樸初因緣人生》（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以為此先生為陳曾壽。陳曾壽（1878~1949），字仁先，湖北蕪水人，是近代宋派詩的後起名家，與陳三立、陳衍齊名，時稱“海內三陳”。

㉙⑳《趙樸初韻文集》，第487、354頁。

㉚叔本華：《作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沖白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第136頁。

作者簡介：吳懷東，安徽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合肥 230039

[責任編輯 桑海]